

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

MAKES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陈潮光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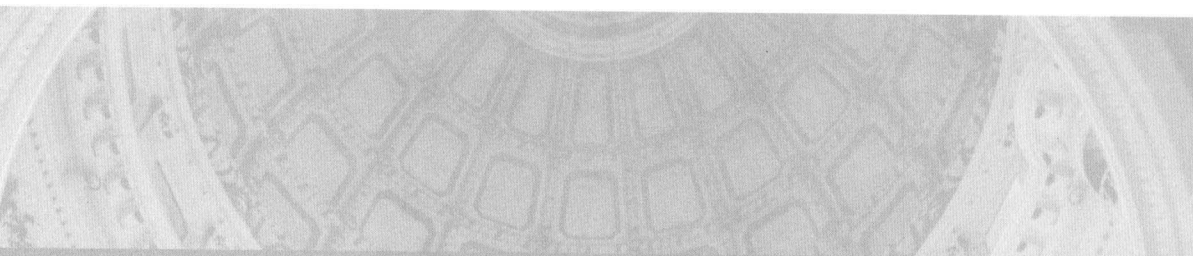
● 人民出版社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文库

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

MAKES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陈潮光 · 主编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陈潮光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7-01-008338-4

I. 马… II. 陈… III. 马克思主义-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553 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MAKES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陈潮光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65 千字

ISBN 978-7-01-008338-4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	
——兼论理论假设的分类	程恩富 (3)
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矛盾的表现、成因及解决对策	陈潮光 (35)
天壤之别的两个公有制世界	
——柏拉图与马克思	赵学增 (45)
论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杨永华 (55)
两种经济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	许卓云 (67)
以马克思地租理论指导我国农地转用中的	
土地增殖收益分配	林 勇 (76)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李健英 (83)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探析	刘志光 (96)
市场经济：新视角下的重新认识	
——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	方兴起 (105)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启示	崔慧霞 (126)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

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	刘同舫 (141)
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范畴及其当代意义	余 静 (159)
历史地透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	孙永芬 (169)
和谐之道：劳动范式，还是交往范式	关 锋 (180)
马克思对近代自然法正义观的批判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德意志意识形态》	
.....	林进平 (193)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	刘卓红 (204)
民主的伦理纽带	
——关于德里达两部政治哲学著作的尝试性解读	尹树广 (217)
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刘 梅 (230)
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24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探	陈岸涛 (257)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解读	陈 露 (264)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

——兼论理论假设的分类

程恩富*

本文首先探讨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提出假设的重要差异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然后针对或评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依次阐述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五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和“公有制高绩效假设”。

一、假设的内涵和分类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经济学也不例外。有了前提性假设，才可能有经济学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严格说来，假设有假说与假定两个含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假说法，是指以已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相对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但包

*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 ），男，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分，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假说的验证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实践的相对性。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便，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不过，经济学的假说和假定时常交织在一起，我们有时也就可以笼统用经济理论假设来表达经济思想。

由于以往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某些经济思想和理论视为或同时也定义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交流或论争的需要，现在应当改变某些用语习惯，适度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

例如，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个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之前，没有得到证实，因而还属于假设性质。问题在于，现代西方大多数学者仍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推进交流和论争，我们也可退一步，同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假设。这是因为，严格来说，假设同原理或公理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某一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对实证资料的理解。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将有益于论争的简化和深化。此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须在当代中外多样化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不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认为是某种原理、公理或思想预见，不妨也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有争议的问题在于：经济学研究能不能随意进行假设呢？任意假设是可以的，但这种假设下的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科学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强调学术严谨和贴近现实，不赞成随意假设，因而需要对理论假设进行分类。

第一，根据假设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可分为合乎历史和现实的或背离历史和现实的假设。譬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科斯第一定理”，就属于不现实的假设。其道理，如同假设历史的或现实的计划管理费用为零是一样的。又如，与西方“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不同，笔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可以得到国内外日趋增多的正反历史资料和实例的印证。

第二，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否有效结合的假设为例，我国和越南的历史经验已经部分有力地证明：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假设比较科学，而否定性的假设则是不科学的（科斯也承认，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被证伪）。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相比，“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显得缺乏科学性、历史性和实际性，因为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占有和出租的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不过，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因为依据已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

第三，根据假设的时间跨度，可分为历史型、未来型或混合型的假设。许多假设是依据历史并推测未来的，因而属于包含历史和未来的混合型假设，但西方新经济史学就有历史型的假设。譬如，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斯·豪斯赫尔的《近代经济史》等历史论著都强调了交通运输与工业革命间的互相促进的因果关系。而在交通运输革命中，尤其在19世纪的陆路交通发展中，铁路和火车的诞生与工业革命关系最为密切。钱得勒（1997）深入地讨论了铁路对建筑业和金融业的影响认为，铁路建筑的需求导致了美国金融业和建筑业的根本改革。可是，铁路与工业革命密不可分这个已成为常识性的结论却引起了福格尔的怀疑和反思。事实果真如此吗？福格尔建立了“反事实”论据：复原了当时主要的工业资料，如运费、主要农业贸易流通量的地区

分布、按部门对当时冶金工业交货情况的分析，等等。在此基础上，福格尔得出结论说，以上传统观点所认定的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错误的。他认为，当时只要把美国的水路运输稍加扩大，就能以同样的费用进入95%的农用地；至于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在1840—1860年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因此，不能用铁路来解释该时期美国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他甚至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因此，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福格尔关于美国这一历史时期增长的“铁路微作用假设”便可称之为历史型假设。创新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可积极借鉴这一方法。

第四，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包含完全自私在内的“经济人”假设，就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以偏概全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被确认为“公理”。依据整个人类历史和问题导向，我们必须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其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同理，“菲利普斯曲线”是依据英国1861—1957年间的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历史资料来表述两者之间关系的，有学术和实际价值，但过去被视之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定律则不妥，其实它仍然具有历史型假设的性质，而且是不具普适性的片面假设。因此，2006年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菲尔普斯就曾提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而且与企业 and 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从而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增长的历史现象。

另外，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定或假设之一是资源有限与需要（欲望）无限。这一“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假设”也是片面的，因为这一假设内含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约束条件不对称。反思性地改造西方主流学者的上述理论假设的必然结果，便可推陈出新地作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

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这样的理论假设反映现实全面，论证逻辑严密。

第五，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较基本的或较具体的假设。作为史学和经济学重要方法的唯物史观，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两重性观点，便属于抽象度较高的基本假设，而马克思关于个别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等一些假设，则属于较具体的层面。

此外，即使是同一较基本的理论假设，也要视实践环境不同而有所具体化。以“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为例，笔者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而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实践环境中，“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有内涵和前提条件的差别。

最后，必须指出，假设的不同显示出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和体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判断假设的好坏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建构的理论是否有效，即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准确的预测；宣称理论的意义越多，假设就越不现实。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基于以上不同理论假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从而呈现为不同的现代理论经济学范式。变革中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体现“国情为据、世情为鉴，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就必须独特性地推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等上述几个关键性的理论假设，并达成学科共识。那种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

学的关键性理论假设及其范式具有普适性或普世性，需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思想，显然是幼稚的。因为只有在关键性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才能通过中国化或本土化，来真正促进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二、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要义

依据已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具体说来：

第一，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物质技术业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

第二，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员空间位移的运输劳动，提供书信、消息、电报、电话等各种信息传递的邮电劳动。场所变更或信息传递就是广义交通劳动产生的效用，它们是可以发生在流通领域内的特殊生产性部门。这也是马克思基本阐明的观点。

第三，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其中包括讲课、表演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应当突破价值创造仅限于物质劳

动的理念，确认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1〕}

第四，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直接涉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除了包括上述有关人们生活的生产性部门以外，还包括医疗、卫生、体育、美发、美容、沐浴等等。^{〔2〕}

第五，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中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承认，在公有制企业内，厂长经理从事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而对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部，从事生产性经营管理的活动能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则持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这在分析逻辑上就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本来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管理活动，一旦与该企业的财产私有权相结合，便全部丧失其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属性。其实，倘若生产性私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所有者，同时又是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劳动职能，客观上会创造商品的新价值；二是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占有他有的剩余劳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并由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妨碍在科学分析进程中加以定性区别。^{〔3〕}

第六，劳动生产力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马克思在阐述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时舍掉了劳动的主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而认定劳动的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引起使用价值量变动，不会影响价值总量，所以就得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相变化规律。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引起劳动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科技的

〔1〕 这是程恩富1993年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一书已突破和2001年全面倡导的观点，现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第一个突破”。参见《倡导“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光明日报》2001年7月17日。

〔2〕 这是程恩富2001年正式提出并被广泛认可的“第二个突破”。参见程恩富：《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3〕 这是马克思没否认而未强调的论断，程恩富在1995年撰文实现的“第三个突破”。参见《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经济管理活动创造价值吗》，《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4日。

进步，而它会引致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进而增大商品的价值量，并由此增大社会价值总量。(1) 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劳动的主观劳动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是反向变动关系，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是存在的。(2) 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是正向变动。(3) 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方向不确定，也可能是正方向变动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也可能不变。(4) 由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而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主要的，因而长期来看商品的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会具有一种向上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不变。我们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作了如上的界定和新理解，就可以科学的说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等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事实。^{〔1〕}

(二) 与新假设密不可分的“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

与上述“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密切相关的是“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必须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就劳动过程而言，显然，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其中，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和构成的。同一些论著随意批评马克思经济学忽视财富及其生产要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是一贯高度重视财富及其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的。

十分明显，这里的“全要素财富说”与“活劳动价值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关于创造商品和财富的完整理论。前

〔1〕 这是程恩富提出的“第四个突破”，即需要突破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价值量不变的假设与论断，确立科技等劳动的复杂性和熟练性的提高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一般会增大商品价值量这一新观点。详见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第10期。

者说明的是作为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财富（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财富的源泉必然是多元的。后者说明的是作为抽象劳动的活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新价值创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价值的源泉又必然是一元的。

同时，两者的内在联系又表明：作为劳动主体的活劳动，既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作为劳动客体的有形或无形生产资料，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价值创造的必要经济条件或基础。但是，要素价值论者声称财富的源泉就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既然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劳动也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的劳动一起共同创造价值。在这里，他们混淆了财富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创造过程等一系列区别。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必须指出，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广义上看，按生产要素分配中自然包括按劳动力这一主体性要素分配（在了解劳动与劳动力的严格区别后，不妨碍我们说劳动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而市场型按劳分配，首先表明的是要视劳动力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凭借自身的所有权参与分配，其次才表明要根据劳动力的实际有效支出或贡献，即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具体确定可分配的价值量或金额。这不会否定我们经常从狭义上按劳分配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独立出来，并分别加以阐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状态与生产成果的多种分配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这启发我们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可以提炼出“多产权分配说”，即多种产权关系决定了按资和按劳等多种分配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多种分配形式都直接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或产权。^{〔1〕}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章；所有权与产权在广义上可以相等，详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6页。

事实上，劳动价值论是一切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商品之间的一般规律以及劳动机制和价值机制，指出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保存旧价值；而马克思描述经典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因而劳动价值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直接依据。不过，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劳动价值论同市场型按劳分配有了一定的联系，因为分配的是商品出售后价值，又由企业自主分配并完全货币化。尽管市场化按劳分配的直接依据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公有制范围内的工资既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也是市场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进一步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所有者在自身创造财富和价值过程中的具体贡献来分配的，而其经济实质是按生产要素所有者在要素创造财富和活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贡献或提供的要素数量及其产权关系来分配的。这就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与实质，用哲学上的形质来表达，可简称为“按贡献分配形质说”。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抓住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或表象当作其本质，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承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或表象，又揭示其经济实质，并在形式与本质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和新用“按贡献分配”这一术语。这与西方经济学一贯主张按贡献分配的诠释和立场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的论著以为只要承认“按贡献分配”的用语，就等于承认生产要素所有者都亲自创造或贡献了财富和价值，并据此进行分配。这是有误的论证。其理由在于：当我们使用“按贡献分配”一词时，只是承认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下要素所有者拿出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本等非劳动性质的要素同劳动力相结合，进而由劳动者运用非劳动生产要素实际创造财富和价值。从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来分析，要素所有者只是在实际生产财富和价值之前的购买阶段从“预付”、“拿出”或“提供”的意义上“贡献”了非劳动生产要素，而所有的财富和价值都是在生产阶段由劳动者运用非劳动生产要素进行实际创造和生产的，并在生产阶段结束后（若是商品则在销售阶段后），由购买阶段的各个要素所有者依据“预付”要素的数量